

【思想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卫道士和布道者 ——论辜鸿铭

张娟芳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大变革为背景,对辜鸿铭通过中西文明的比较,向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向西方世界宣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推动中学西渐所做的工作及其影响进行了阐述,认为辜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卫道士和布道者。

关键词:辜鸿铭;中西文明比较;卫道士;布道者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3)01-0016-04

The Defender and Preach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on Ku Hung-Ming

ZHANG Juan-fang

(Institute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and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this paper expounds Ku Hung-Ming's comparative study of Sino-Western civilization, appreci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spread of it to the Western world, the devo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learning to the outer world, and the impact of all his efforts as well. It is thought that Ku is both a defender and a preach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Ku Hung-Ming; comparative study of Sino-Western civilization; defender; preacher

一、“文化怪杰”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思想文化深刻变革的时代,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深层的嬗变,中西文化剧烈的冲突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因其诸多主客观条件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复杂纷繁的状况,他们的人生道路、思想观点、个性与命运各不相同,固守传统与激进改革,文化本位与全盘西化,脚踏中西与偏颇极端,成就了许多改革家、思想家,也造就了不少卫道士、布道者。辜鸿铭就是一位中国传统思想的卫道士和布道者。

辜鸿铭是清末民初的名士,“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

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1]也正是这种矛盾给人造成了古怪与顽固的印象,连德国人都说他“完全是一个禀性古怪的人”,有“放荡不羁,我行我素的天性。”^[2]他生前好逆历史潮流而动,好发奇谈怪论,行为乖张,荒诞不经,轶闻趣事广泛流传,引来过一阵阵激烈的抨击或热烈的赞扬,但基本上被当作一种供人茶余饭后资谈的漫画式的滑稽人物;他死后很少有人深入研究他的思想和行为,在喜剧性油彩淡化后留下了一个扑朔迷离、颇具神秘色彩的“文化怪杰”的形象。辜鸿铭于1857年出生于马来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祖籍福建同安,其母为西洋人。他自幼俊敏,才气横溢,聪颖明晰,被一个苏格兰传教士看中收为义子,13岁时被送往英国爱丁

堡大学读书,187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而后又到德法、意游学,取得德国莱比锡大学土木工程学文凭。辜鸿铭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外国度过的,受过广泛系统的西方教育,邃于西学西政,通晓英、德、法、意、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1882年他在新加坡得遇洋务思想家马建忠,晤谈三日,从马处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与魅力,决意回国。后入张之洞幕府,逐渐“中国化”,倾心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之道,文化观和政治态度日趋保守、顽固,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辛亥革命,甚至在清王朝覆亡后还仍拖着一条辫子,对人们公认的“国渣”如小脚、辫子、纳妾、八股等十分向往,不同程度地加以赞美、辩护,使得凡是认识他的人、听说过他的人,不论知深知浅、或藏或否,无不归之为“古怪”,有“辜疯子”之称,例如林语堂把他誉为“怪杰”,胡适称他是“怪物”,周作人则说“北大顶古怪的人,恐怕众口一词要推辜鸿铭了”。这样就使辜鸿铭留给世人一种印象,似乎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封建遗老遗少,近代中国最顽固保守的文化人。这是十分片面的,肤浅的,这一半原因在于他的言行易走极端,在汹涌澎湃、不无偏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竟然特立独行,逆而行之;一半原因也是因为他的著述除《张文襄幕府纪闻》、《读易草堂文集》等少数是用中文写的外,其余都是用外文撰写、发表在国外刊物上的,限制了人们对他全面、深刻的了解。也许更深的原因是他大半生一直生活在外国,归国后所读圣贤经典中描述的美好和他所从事的上层贵族化事业(幕僚、学者、教授)与中国当时社会现状差距太大,辗转于兵荒马乱、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对他自然不可理解了。在拨去历史浮尘之后,在改革开放、中外文化交流非常活跃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辜鸿铭进行全面、深入的认识与评判。在这方面已有一些老前辈和青年学者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笔者只想对辜鸿铭通过中西文明比较、心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向西方宣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推动中学西渐所做的工作及其影响加以阐述。

二、中国文化的卫道士

辜鸿铭的中西文化观是比较庞杂的,但其主线还是明晰的,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和赞扬,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和否定,比起同时代的其他文化保守主义者(如严复、林纾等)他的观点更偏颇,更走极端。辜鸿铭认为,“文明的真正涵义,也就是文明的基础,是一种精神的圣典。”^[3]文明的核心是教养水平和道

德标准,衡量一个“真正的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人生哲学”,而不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的进步^[4]。这是就一般而言,具体到中国文明,他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道德的、真正的文明”^[5]。“在中国古代经典里,‘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秩序与发展’,教育不在于知识的积蓄而在于知性的发达。有知性就有了秩序,有秩序—道德秩序,就有了社会进步,中国语言中‘文明’虽然没有明确的含义,但从其文字的构成来看,它由‘美好和智慧’组合而成,即美好的智慧的东西就是文明”^[6]。他积极肯定“在中国文明当中,有着别处难以找到的社会价值”,你与之一旦接触,“马上就被一种难以言状的魅力所吸引”^[7]。也许正是这种价值和魅力,使浸淫了西方文明的辜鸿铭在接触了中国传统文明后立即投入传统文化的怀抱,完全被征服;而被征服了的他,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一种过分自大和虚骄的心态评价中西文化,甚至对传统文化中一些封建糟粕和陈规陋习进行辩护。

对于东西文明的差异,他认为“从根本上说,东洋文化就像已经建成了的屋子那样,基础巩固,是成熟了的文明;而西洋文化则是一个正在建筑当中而未成型的屋子,它是一种尚不牢固的文明”^[4]。无独有偶,西方汉学家也有过类似的判断,例如歌德就说过东西两个世界存在根本的不同,在中国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世界,而西方则正在发展变化中。中国文明是代表一种不能更加发展,而属于凝固了的形式^[8]。我们知道,成熟就意味着衰老、僵化、定型,对此,辜鸿铭似乎不是十分清楚的,他对中国文明表示的赞赏,正与歌德的婉讽形成对照,他认为“欧洲没有真正的文明,因为真正的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人生哲学,但欧洲人没有。在中国,把真正的人生哲学称为‘道’,道的内容,就是教人怎样才能正当地生活,人怎样才能过上人的生活”。接着,他还从五个方面对东西文明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第一,在个人生活方面,欧洲人没有正当的人生目标;相反,东洋人早已全然领会了人生的目的,这就是“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为孝子,在国为良民。“孝悌仁之本”,是中国人的人生观,也是东洋人的人生观。关于这方面,再一个差别就是,欧洲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运动,而东洋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生活;西洋人为运动而生活,东洋人则为生活而运动;西洋人为赚钱而活着,东洋人则为人生而创造财富。第二,关于教育问题,欧洲人教育的目的,在于怎样做一个成功的人?怎样做一个能适应社会的人?而东洋教育,不仅能使其子弟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而且还能促进现

代世界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第三,在社会问题方面,东洋的社会,立足于道德基础之上,而西洋则不同,西洋的社会是建筑在金钱之上的。这就是说,在东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道德关系,而西洋则是金钱关系。第四,关于政治问题,欧洲早期是通过基督教来统治人民的,文艺复兴之后所行的是强权政治,到现代就变成了混乱加上警察的社会;而东洋人,既没有对神的恐惧,也没有对警察的恐惧,是靠了良心、廉耻和道德观念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第五,关于文明性质的差异,欧洲文明是把制作更好的机器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东洋文明则把教育出更好的人作为自己的目的^[4]。“近代欧洲的进步重点放在产业和机械工业的发达,而古代中国则侧重于人的进步,人的灵魂的、理智的进步”^[6]。这种比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反映了辜鸿铭精通东西学术和社会文化,能够站在比较文化的角度进行论述,是有必要进行研究、分析的,但他的有些观点明显地缺乏科学依据,有情绪化之嫌。

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辜鸿铭还对中西民族性格和文明特征作了有趣的比较。他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 broad and simple);而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却不纯朴。后来,他还对中国人补充了一条:灵敏。这样的比较和概括不一定科学、准确,但并非毫无价值,对于我们的思考和研究不无启示。他还认为,中国文明的精髓是“义”与“礼”并重,而希伯莱文明曾授与过欧洲人以“义”的知识,但没有授与“礼”,希腊文明曾给过欧洲人以“礼”的知识,但未兼及“义”,并把这一观点提高到宗教高度,说“义”与“礼”实际上就是“孔子赋予我们中国人良民宗教的精华”。辜鸿铭进行这些比较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西方诸国人研究中国文明,“美德、英三国人通过研究中国文明、研究中国的典籍和文学,都将由此获得一种精神特质,即美国人变得深沉起来,英国人变得博大起来,德国人变得纯朴起来,甚至所有欧美人都大获裨益”。辜鸿铭说,他通过比较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为了证明中国文明的价值”,说明“研究中国文明,不仅仅是汉学家们的事,而且它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这些想法从心理学上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在当时西方列强内部激烈竞争,乃至引起世界大战,外部对弱小和落后国家(包括中国)虎视眈眈,时刻企图侵略、瓜分的情况下,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天真

想法,是一种书生迂腐之论,也可以看出他过分夸大了中国文明的力量。

从总体上看,辜鸿铭对中西文明及其特点的具体比较,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文明弊端的尖锐批评,对中国——东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某些特点的揭示,有独创性的闪耀的火花,能够引人深思,给人启迪,但真理多走一步就成了谬误。在中西文化比较中,他还发了一些极端的、荒唐的谬论。例如,他认为中国的“人治”远优于西方的“法制”,因为“人治”依赖的是人的道德的自觉和高尚,而“法制”依赖的只是一纸僵死的条文,按照这一思路,他就必然为中国的皇权专制辩护。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就是以孔子的“春秋名分大义”,或称“春秋大义”为主进行论述的,他认为孔子整理删定的《春秋》一书是部“传授忠诚之道的著作,就是中华民族的大宪章,它使全中国人民和整个国家绝对地效忠于皇帝。”他用英文发表的《尊王: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本人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陈述》等几篇文章中谴责西方列强侵略,却为清政府、慈禧太后辩护。在这些文章中,他指责列强“袒护康党”,而认为实际上慈禧太后是德高望众、才识过人,“三十余年,盛德崇功不可殚述”,“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这就明确地宣扬忠君思想,为专制君主歌功颂德。还有,他竟然对中国妇女的“三寸金莲”十分迷恋,认为中国传统妇女的幽闲温柔、恬静腼腆与裹脚有密切关系,而西方“大脚妇女”是健壮、粗野、无礼的。他还对妻妾制度进行辩护:“在中国,正是妇女的那种无我,使她的丈夫能够、或允许丈夫纳妾,同时她却没有受到伤害的感觉,……在中国,与其说丈夫纳妾就不能真正地爱他的妻子,毋宁说正因为他们极其爱他们的妻子,才有纳妾的权利和自由,且不用担心滥用这种特权和自由”^[9]。

三、中国文化的布道者

也许正是因为辜鸿铭对西方文明的尖锐批评态度,看到西方文明的“流弊无穷”,认为只有中国传统礼教和“周孔之道”能够“补救西方文明之弊病”,他在回归之后把自己的大半生都花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悠久绵亘的传统思想文化的工作中。他用英文翻译儒家经典《四书》,超越了传统注疏家的拘束,也没有完全采用宋儒朱熹的原注,常常自己别创新意,以现代观念和从西方人思维习惯出发,进行独辟蹊径的阐述性翻译。在英译《论语》序中,他说他是“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为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其目的是让那些受过教育

的有头脑的英国人,在耐心地读完这本书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改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在英译《中庸》序中,他说他翻译这本小书是为了“能有助于欧美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中国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形成一种更明白更深刻的道德责任感,以便能使他们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时,抛弃那种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态度,而代之以道,无论是以个人的方式,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同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都遵从道德责任感——那么,我将感到我多年理解和翻译这本书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白费。”这些目的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他的译书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清史稿·列传》谓辜鸿铭“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籍,爽然曰:道在是矣!乃译四子书,述《春秋大义》及《礼制》诸书。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给西方文化界以强大的震撼。辜鸿铭认为现代“欧美以强权为治,弱者当之辄靡,群强相处则争,异日列强竞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弭此祸,顾西人尚未见及此,乃译四子书,及中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稿,列国争传译,及巴尔干战事起,先后三年,卒如君言。于是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讲座。”^[10]掀起了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热潮。

1910年,辜鸿铭用英文撰写了《中国人的牛津运动》,全书从19世纪英国红衣主教纽曼在英格兰进行的反对自由主义、复兴早期基督教传统的运动与清末张之洞为主的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西方物资实利主义文明,倡导按儒家传统办事的清流运动进行比较,目的是要让他们英国人了解中国事情的真实状态,改变他们带有自由主义、个性主义色彩的错误观点,希望他们在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破坏面前树立两种观念:“知识上的门户开放”和“道德上的扩展”,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最后,他十分惋惜纽曼与张之洞的奋斗失败。这部书后经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Wilhelm)译成德文,还加上了其它论文,更名为《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抵抗》,对德国学者影响很大,哥廷根大学的新康德派学人十分推崇。1934年9月《人世间》12期上登过嗣銓的一篇文章,记述了辜鸿铭在德国的影响,一位教授听到他作为中国人对辜鸿铭所知甚少,“大为诧异”,对他说:“辜鸿铭的著作我幸读了几篇,据我看来,他的哲学,意义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这位教授还向他推荐辜的书。后来,他又遇到两位哲学教授,也很敬仰辜,其中一位还只是向学生特别推荐

辜鸿铭,另一位甚至告诉他的学生,如果不懂辜鸿铭,便不准其参加讨论。可见,德人对辜的折服与崇拜。欧战爆发前两年,辜鸿铭曾致函德国汉学家奥斯卡·A·H施密茨,认为欧洲“文化”会因英国实利主义的胜利而迅速衰落。^[12]欧战爆发后,辜鸿铭写了许多文章攻击西方文明,鼓吹儒学救世,把孔子推荐给西方人,认为儒教是“贤人的宗教”,可以把欧洲人从战争的泥潭中拯救出来。1915年,他还写成专论《中国人的精神》,该书通过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与欧美文化,阐明了中国人的精神,揭示了中国文化深远博大的内涵,向天下昭示文化的本质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人格与道德,鼓吹中国文明救西论,在西方引起鼓动,特别是在德国一些对资本主义前途失去信心的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共鸣。辜鸿铭的文章以德文大量刊登在一些杂志上,一些大学还成立了“辜鸿铭俱乐部”、“辜鸿铭研究会”等。对于这种影响,当时的中国学者进行过描述,辜鸿铭面对当时“世乱”愈急的形势,他自己“年愈高,遇愈穷,而气愈壮,日以欧文倡导纲常名教以发蒙振遇,每一文出,各国争相移译。”因为此时欧人鉴于战祸,又闻辜之言,“始恍然于富强之不足以图治,而三千年之东方文化乃侵侵有西被之势。”^[11]

由于辜鸿铭在西方的广泛影响,他还与一些世界名人有过广泛联系,受到他们的赞扬,这也应该看作是他向西方“布道”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证明。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与中国人通信的仅有两位,辜鸿铭就是其中之一。托尔斯泰与他讨论抵御近代西方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破坏力量的方法,交流东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经验。托尔斯泰认为孔子的“恕道”是尊重一切,这可能是受辜鸿铭的影响,俄国作家维列萨耶夫在《回忆托尔斯泰》一文中即有此猜测。辜鸿铭的文化观曾给斯宾格勒以深刻的影响,《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影响的印记。英国作家毛姆到中国来,想方设法拜访他,认为他是“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并洗耳恭听辜鸿铭发表的对于西方文明近于尖刻的批评。此外,法国的罗曼·罗兰、瑞典的勃兰兑斯、印度的泰戈尔和甘地等,在不同场合对辜都有好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辜不仅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卫道士,而且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真诚布道者。他俨然以一个救世主的身份,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用流畅的英文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介绍到欧美诸国,还用外文撰写了不少著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下转第23页)

先,人应该与自然界和谐共赢;其次,人应该与人和和谐共赢;最后,人还应当自我克服,自我战胜,表现为社会发展(主要是物质文明)与个人全面发展(表现为精神文明)的和谐共赢。这样萨特极力否定人际关系的“共在”性(亦即“共赢”性),大肆宣扬人与人乃至人与自然只能是“紧张状况”的观点也就被解构了!巴雷特等人认为,西方人的三重异化(如前所叙)正是存在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4],后现代主义“反拨”“异化”哲学——存在主义的观点的出现,正显示着学生对老师有所超越的历史势态。

总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二战后一段时日的时代之音。然而,20世纪

80年代却在中國大陸找到了许多青年“知音”,这与中国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如遭受过“文革”冲击)不无关系。站在新世纪新千年的地平线上,用新的观点清理这份思想遗产就显得很是必要了。

参考文献:

- [1] 萨特.存在虚无[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7.
- [2]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 [3] 萨特.关于哲学问题的最后一次谈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 [4]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上接第 19 页)

华传播到西方,在西方世界中产生了积极的文化效应,增强了西人对中国文明的深层了解。理解,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人对中国的陌生和偏见。他的这些工作在当时西方思想文化潮水般涌进中国,使中国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从,进而论争纷纭,论战不休,对一般年轻人造成了精神上的空白,他们的心灵在这空白里迷惘乃至错失的情况下,是一种逆流而动的行为,故而在中國遭到了人们的误解、反对和嘲弄。但他特立独行,努力于中学西渐,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在当时乃至今日,许多人对他的这些功绩不一定有深入的了解,也不能够作出公正的评价。因此,笔者觉得还有必要对他进行深入、细致、客观、冷静的研究,以引发对“辜鸿铭现象”及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历程的深层思考。

参考文献:

- [1] 温源宁.辜鸿铭先生[A].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C].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6.
- [2] 德·奥斯特·A·H·施密茨.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自序

[A].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C].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6.

- [3] 辜鸿铭.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A].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C].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6.
- [4] 辜鸿铭.在东西文明异同论[A].黄兴涛译.辜鸿铭文集(下)[C].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6.
- [5] 辜鸿铭.英译中庸序[A].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C].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6.
- [6] 辜鸿铭.中国古典的精髓[A].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C].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6.
- [7] 辜鸿铭.告准备研究中国文化的欧美人[A].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C].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6.
- [8] 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M].朱杰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9]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A].辜鸿铭文集(下)[C].黄兴涛等译.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6.
- [10] 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A].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C].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6.
- [11] 罗振玉.读易草堂文集序[A].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C].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6.